

(汉)刘向撰 程翔译注

说苑译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刘向撰 程翔译注

说苑译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苑译注/(汉)刘向撰;程翔译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301-15007-8

I. 说… II. ①刘…②程… III. ①笔记-中国-西汉时代②说苑-译文③说苑-注释
IV. K234.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320 号

书 名: 说苑译注

著作责任者:(汉)刘向 撰 程翔 译注

责任编辑:张弘泓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007-8/H·222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75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6.25 印张 彩插 1 99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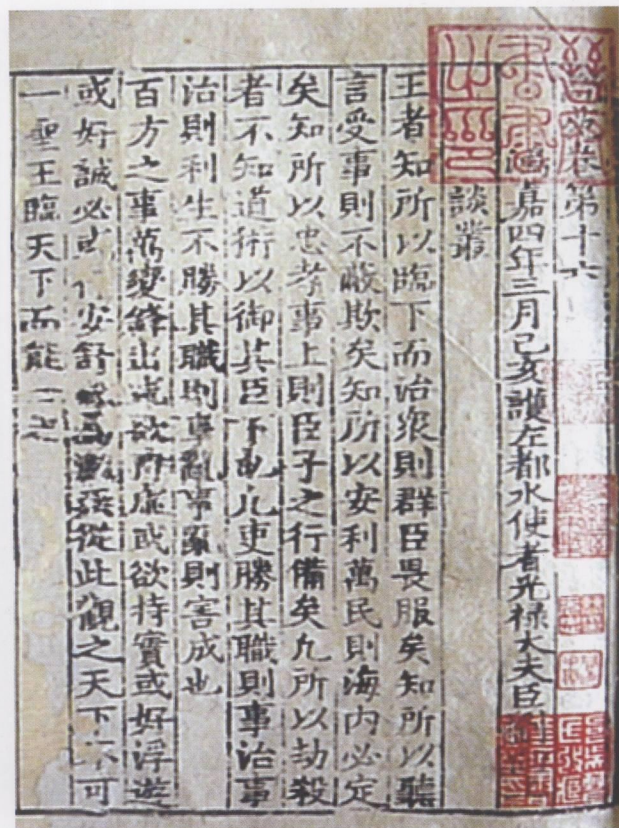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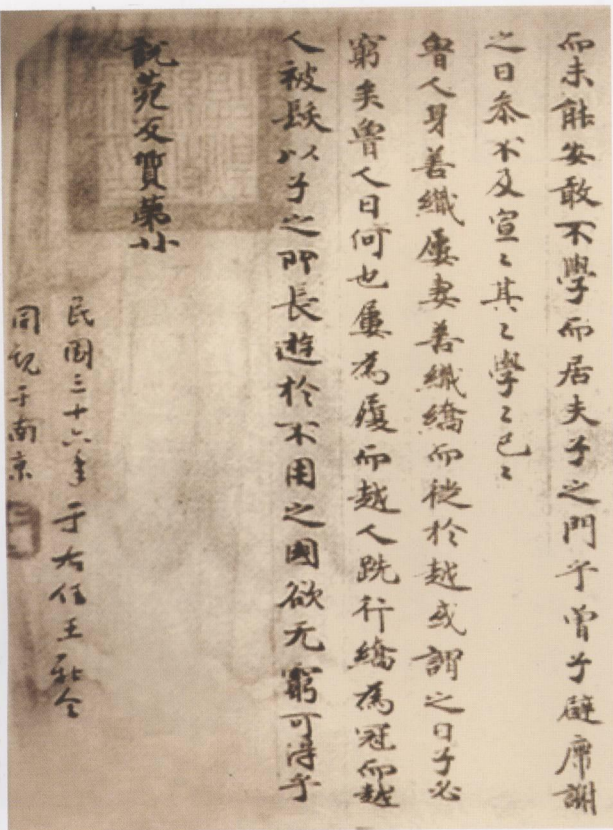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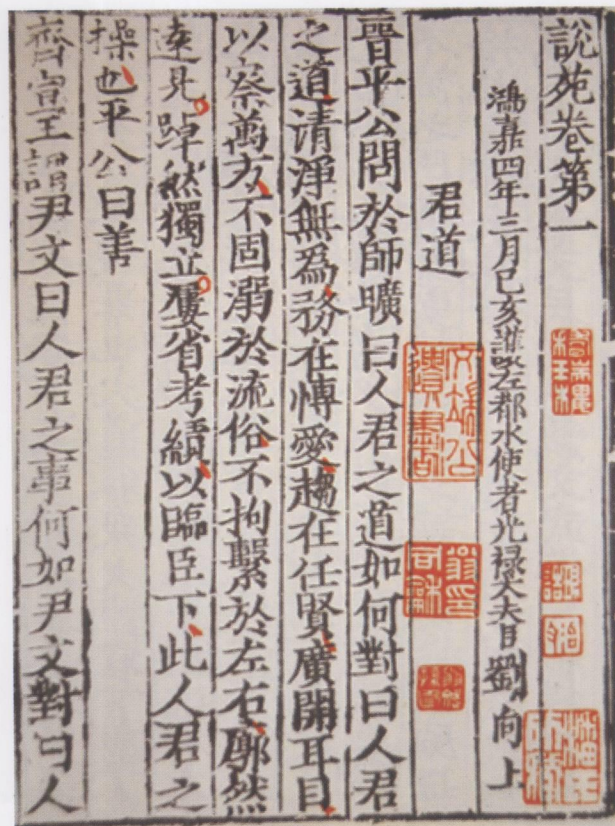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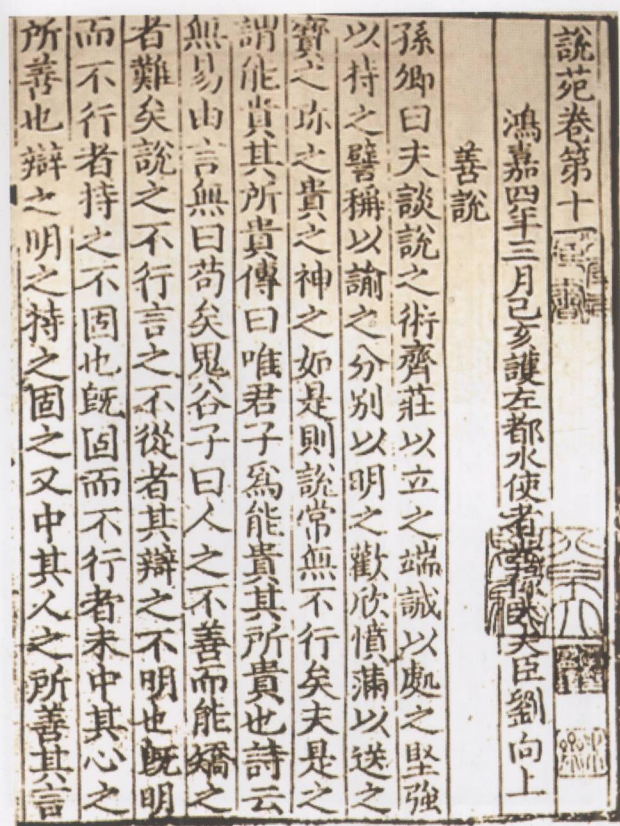
南宋初刻本《说苑》(残本,存第十六至第十九卷)书影。海内孤本,上海图书馆藏。



敦煌文物研究院藏唐写本《说苑·反质》残卷。
苏州大学王继如先生提供。



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本《说苑》书影。



宋刻本《说苑》(残本,存第十一至第二十卷)书影。海内孤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即元大德云谦本所据影刻之底本。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



校正劉向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元大德七年(1303)云謙影宋刻本《校正劉向說苑》書影。

海內孤本,上海圖書館藏。

平湖葛氏傳朴堂藏明代抄本《說苑》書影。

《四部丛刊》本。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撰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說苑

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

民國元年(1912)鄂官書處重刊本《說苑》書影。

民國六年(1917)潮陽鄭國勳刻“龍溪精舍叢書”

《說苑》書影。

前言

一、刘向生平简介

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①,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属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祖父刘辟疆,有清望,为武帝所重,任过宗正。父刘德,曾受召甘泉宫,武帝誉为“千里驹”^②,也做过宗正。刘向身为皇室宗亲,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岁凭借父亲地位荫任辇郎,侍卫皇帝出行。成年后,刘向“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又因通达能属文辞,献赋颂,展露才华,被宣帝选为名儒俊材,常侍皇帝左右,待诏金马门,并开始接触中秘书(皇家图书),为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1年,汉廷召开石渠阁会议,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立《穀梁春秋》博士”^③,并诏命刘向传授《穀梁春秋》,从此“穀梁之学”大盛。这是刘向学术生涯的发展时期。后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公元前48年,刘爽即位,为汉元帝。当时辅政大臣萧望之与宦官弘恭、石显形成两大势力。弘恭、石显在宣帝时就任中书令,“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又勾结车骑将军史高等,在朝廷上与萧望之作对。萧望之认为重用宦官本不是国家旧制,也违背古人不近刑余之人的规定,应当革除宦官专权的弊制,以士人代替宦官担任的要职。这就与弘恭、石显等人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多次较量,皆遭失败。公元前47年,萧望之下狱后饮鸩自杀,刘向也因此被免为庶人,废弃十年。

公元前32年,刘骥即位,为汉成帝。石显因罪死亡,刘向复出,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他更名为“向”,表达了对皇帝的无限希望之情。然而这时把持朝纲的外戚王凤对刘向这样的皇族心存戒备,不让他进入权力中枢。河平三年(前26),54岁的刘向受命主持中国文化史上一项浩大的工程——以光禄大夫的身份主持校理皇家图书,即中秘书,其子刘歆担任助手。三年后,刘向任中垒校尉。

我国《诗》《书》遭遇秦火之后,天下民间藏书大为减少。项羽烧秦宫,官府所藏荡为灰烬。汉代之初,萧何重视文化典籍的保护,主持修建了三座皇家藏书楼,名为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到武帝时,汉朝又建立了国家(外廷)和皇家(内廷)图书馆,并诏令天下献书。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下诏令礼官劝学,到汉成帝河平三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但未经整理,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刘向奉诏承担的这项文化整理工作,具有格外深远的意义。刘向不间断地工作了19年,卒于任上,写出了中国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别录》。其子刘

① 刘向生卒年有四说。本书采用钱大昕之说。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与徐兴无《刘向评传·刘向生卒年考异》均持此说。

② 《汉书·楚元王传》。

③ 《汉书·宣帝本纪》。

歆继承父业，撰写了《七略》。尽管这两部书久佚，但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知其概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所见之书，大概来自四个方面：1. 宫廷藏书；2. 太史书；3. 太常书；4. 私家藏书。刘向掌握了这些不同的版本后，进行校勘，校讎讹文脱简，这便是校讎学。因此，刘向还是中国校讎学的开创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刘向所写的“叙录”（“书录”）10篇，计有：《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叙录》《孙卿书录》《韩非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书录》《关尹子书录》《子华子书录》和《说苑叙录》。另外还有大量的“叙录”没有流传下来，比如《楚辞》是刘向编辑并定名的，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别集，但该书的“叙录”已不传。谢明仁在《刘向〈说苑〉研究》中列出了刘向校录的古书55种。这些工作奠定了刘向在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地位。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中有这样的赞叹：

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死，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明解故》中还说：

刘向父子总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讎编次》中说：

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者，向之力也。

刘向一生热衷政治，但最终与权力中心失之交臂。这既是刘向的遗憾，也是刘向的幸运。正是因为他没有陷入争权夺势的漩涡，得以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才有了永垂青史的刘向。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幸事！

刘向本人的著作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残存）《五经通义》九卷（残存）《五经要义》五卷（残存）《别录》二十卷（残存）《列女传》八卷（存）《新序》三十卷（存十卷）《说苑》二十卷（存），赋三十三篇（今残存《九叹》等数篇）《说老子》四篇（佚）等。还有奏议十一篇。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多数已亡佚，虽有严可均、陈寿祺等人的辑佚，但终归失多存寡，难见全貌。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身为皇族成员，积极维护刘氏江山是刘向义不容辞的职责。反对宦官乱政，力排外戚势力，对上忠谏直言，虽然屡遭贬黜，备受打击，然初衷不改，忠君报国之心可谓诚矣！刘向的思想体系中，天人感应，灾异映世的思想十分突出。他多次上书，借天灾言人祸，劝皇上谨守君道，戒奢倡俭。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颂圣君，歌贤臣，近贤远佞，保民安邦，致天下太平昌盛，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思想中又掺杂了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因素，呈现出比较宽宏包容的一面。《说苑》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体系。

二、《说苑》一书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说苑》成书于刘向校理中秘书期间。现存最早的两个宋刻本《说苑》残卷均注有“鸿嘉四年三月己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字样^①。该书是刘向对中秘府原藏书《说苑杂事》进行整理后编著而成^②。该书既是刘向广采群书编辑而成的结果,也有刘向修改加工润色乃至虚构的成分。全书十余万字,分为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下摄数十章。第一章是总论(个别卷数除外),后面各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主旨。这种编写体例明显受了《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影响。

从刘向对全书二十卷内容排列的顺序可以看出,该书是写给皇帝看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第一、二卷是“君道”和“臣术”,与此前其他书相比,有了明显不同。《荀子》中“君道”“臣道”排在第十二、十三卷,而《荀子》一书是经过刘向亲手整理的,《孙卿书录》尚存^③。这种排列顺序的变化,说明刘向看到了君王和大臣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后面的十八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国家政治进行了阐述,它们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这十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家政事的所有方面,可以看作是治国的纲领。尽管这种归类划分不十分科学,但它对后世类书的编纂无疑具有启发借鉴意义。《说苑》是一部窗口式著作,虽然它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但兼有道、墨、法家的主张。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尊贤斥佞,知恩图报,奖功罚罪,加强修养,重视治术,不辱使命,修文尚乐,戒奢倡简,乃至天文地理,等等,内容十分丰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和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均有论述。另外,《说苑》在外交、军事、音乐、丧葬、天文等方面,均有所涉及。由于本书中每一卷前的“题解”对本卷内容均有较为详细的阐释,为避免重复,此处对这些内容的介绍从略。

下面着重从文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做些介绍。此书以叙述为主,议论为辅。每章多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明显受到了《韩非子》“储说”的影响^④。刘向又有所发展,他在每一段故事开头交代背景,创设情境,造成悬念,然后引出下面的叙述文字,让人物在故事中表现性格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者的叙述意图。与这种叙述方式相配合的,就是适当的虚构。刘向并非完全照搬他书资料,而是适度加工改造,以期更加完好地表达编著意图。如果是议论的文字,就在开头先设置一个“靶子”,然后引出下文,比直接说教显得自然。请看《说苑·杂言》第十章:

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舡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舡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为伤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随侯之珠,国之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驎、騄駼,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初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此时宋刻本《说苑》已面世,故晁公武书中有“鸿嘉四年上之”之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亦云:“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

② 见本书“附录一”《说苑叙录》。

③ 孙卿,即荀卿。汉代因避宣帝刘询讳而改称孙卿。

④ 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221页。

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铘,拂钟不铮,试物不知,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偏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所能耳。若诚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之狗耳。”

这种叙述、议论方式直接影响了后世叙述方式和表达风格。另外,对话叙述体的使用十分普遍,全书多半文字使用了对话叙述体。这大概受到了《论语》等书的影响。对话叙述体的优点在于可以将议论、抒情、描写、说明等多种表达方式糅合在一起,既形象生动,又富有理性,使人物栩栩如生。由于它叙述生动,具有了小说的雏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曾提到该书。杨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指出:“在叙事完整性和曲折性上,《说苑》不少部分不让于先秦诸子,而且繁于六朝‘世说体’。”^①谢明仁在《刘向〈说苑〉研究》中,专辟一章来论述《说苑》的文学性,尤其是它的小说意味。

议论的文字讲究章法。该书有很多章节呈现出“论点——举例——分层次论述——论点”的结构方式。在分层论述时善于使用对比的手法。这种论证结构即便在今天,人们也还经常使用。至于作者议论的语言,充分体现了那种刚性、流畅的“西汉鸿文”的特点。

《说苑》中抒情的句子很生动。刘向是个至情之人,这从他一生的行状里可以得到印证,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正所谓文如其人。比如《贵德》篇第一章中的后半部分,刘向赞颂孔子时的语言就充满了感情:

仁人之德教也,诚惻隐于中,悃悃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系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此之谓也。

刘向的语言善用比喻、类比,注重修辞。郑子瑜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从“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重质轻文与文质兼美”和“论譬喻”三个方面阐述了刘向及其《说苑》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另外,充分利用格言、赋句(整句)来加强文段的气势,注重押韵、对仗也是一大特点。比如《正谏》篇第一章和《谈丛》篇第四十二章: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慧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羈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羈合礼。

① 《杨义文存》第六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欲贤者莫如下人,贪财者莫如全身。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父不能爱无益之子,君不能爱不轨之民;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不能死无德之君。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以卑为尊,以屈为伸。圣人所因,上法于天。

这样的句式,既受了汉赋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后世骈文。

下面再谈谈《说苑》的文献价值。刘向编著此书,广采群书,遍徵百家,涉及大量的古籍,查有实据的达46种,占总数的90%,还有10%出处不详。这些古籍,今或皮藏,或亡佚,但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据谢明仁《刘向〈说苑〉研究》统计,《说苑》与《孔子家语》互见章数共116章,其中可以明确定为本自《孔子家语》的有76章,在群书中高居榜首。而《孔子家语》一书历来被视作“伪书”,在有的学者心目中不值一提。但是如果《孔子家语》是伪书的话,那如何解释《说苑》一书中多达116章与之互见的事实呢?汉代孔安国和刘向都曾经见到过中秘府所藏“孔子家”材料,孔安国整理为今本《孔子家语》;刘向对其进行了粗略的整理,即《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语》。”颜氏此注并不能作为今本《孔子家语》伪书之证,恰恰相反,刘向编著《说苑》时引用了中秘府所藏“孔子家”材料,这些材料与孔本《孔子家语》竟有如此多的内容相同,这就足以证明今本《孔子家语》不伪。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墓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墓木牍,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面世,更是提供了铁证^①。

至于10%出处不详的内容,其文献价值就更不言而喻了。《四库全书总目》称“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汉书·艺文志》所记《河间献王》《子思》《宓子》《魏文侯》《李克》《伊尹》《太公》《惠子》《师旷》《军礼司马法》《黄帝铭》等书,均已亡佚,但从《说苑》一书中可以看到其中部分佚文,具有辑佚价值。再如《辨物》篇第十三章: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千二百黍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关于度量衡最早的资料之一^②。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诸方面的价值,所以《说苑》一书在中国古代具有较大影响。在四部分类中,它归到子部儒家,与《韩诗外传》《孔子家语》《新序》等书一样,成为儒家重要著作。到了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令祭酒李敬:“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③这就是说,《说苑》一书由皇帝御批列为太学课程之一,是国子监生员必读的修身课本,这在《明史·选举志》中也有记载。

从语言难度上看,《说苑》属于比较易读的古书,适合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也适合中学生用来作为文言文阅读训练的语料。在供中学生使用的文言文复习资料中,有一些语段取自该书。

由于该书的内容是广采群书,这必然有一个对原材料的取舍和如何加工使用的问题。

① 参见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通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谢明仁《刘向〈说苑〉研究》第四章第八节,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 见《南雍志·卷一》,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第4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总起来看,刘向对原材料采取了引用、改造、整合、新写的方法^①。总之,该书不仅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教育史、文学史、文章学、修辞学、汉语词汇学上都有其重要地位。

三、关于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的说明

《说苑》一书自汉至唐各代艺文志中均见著录,共二十卷。此书到宋代一度散佚。宋初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人编撰《崇文书目》,记录“今存者五篇(卷),余皆亡”。治平四年(1067),曾巩召编校史馆书籍,为馆阁校勘,整理《说苑》,写有《说苑目录序》,云:“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三篇,与旧为十有八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②淳熙乙巳(1185)十月六日,陆游写《跋说苑》,记录李德刍云:“馆中《说苑》二十卷,而缺《反质》一卷。曾巩乃分《修文》为上、下,以足二十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③尽管陆游写此跋时距离曾巩整理《说苑》时间已久,所记内容与曾巩的记载也不完全一致,但有三点是清楚的:第一,曾巩“正其脱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说苑》校正者,一度散佚的《说苑》在曾巩手中得以恢复。第二,曾巩整理出的《说苑》是写本还是刻本,于史无徵。三,曾巩整理《说苑》后仍有缺卷,他本人及《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題》都未提到高丽进卷事,至陆游写跋时则已经补足二十卷。这说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说苑》最晚在1185年就是这个面貌了。

目前所知,宋代《说苑》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所谓“北宋本系统”(半页11行,行20字);二是“咸淳乙丑本系统”(半页9行,行18字)。如果把曾巩整理本归入前者的话,后者就比前者晚200年。现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咸淳元年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皆属于后一系统,谢明仁在《刘向〈说苑〉研究》一书中已将此系统梳理清楚,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谈谈前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版式特点是半页11行,行20字,白口。江标《宋元行格表》将其归入宋版。此版本黄丕烈收藏过。《蕘圃藏书题识》记,黄丕烈曾收藏过一部北宋版《说苑》(六册),无宋刻标记,每卷标题有“校正说苑”字样,行款与其所藏宋版《新序》多同。黄丕烈认定:“必是北宋以来旧本,因遂得之,取校咸淳重刊本,实多是正,即如卷六‘阳虎得罪’条,多‘非桃李也’四字,卢抱经《群书拾补》中据《御览》以为有‘非桃李也’四字,诎知宋刻初本固有之耶?其它佳处,不可枚举,余悉校诸程荣本,以供同好之传录云。”

这个系统的《说苑》,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也有记载:“此书余甲寅岁代李木斋先生所收。蝶装巨册,微有损泐,望而知为内阁大库之书。纸背钤有‘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大印。其后频年假校而不可得。今岁,先生遗书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乃从典掌者假归,以程荣《汉魏丛书》本校之。程本余前取宋咸淳本校之,所校正之字,二本往往相合。然此本有而咸淳本无者,亦所在多有。余别有跋^④详之,此不赘。余详绎此本,虽字体方正,行款与

① 邢培顺《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材料来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滨州师专学报》2004年3月。

② 见《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十有三篇”和“十有八篇”为误记,当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題》记为从士大夫间得十五篇,合为二十篇。

③ 见《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 指《藏园群书题记》卷第六《校宋本说苑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海源阁藏宋本合，然气息孱薄，宋讳不避，疑为宋末元初覆刻之本。至木斋先生定为北宋刻，则非末学所敢知矣。”《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著录此本，定为“宋刊本”，半页11行，行20字，白口，现存十一卷至二十卷，三册，未有袁克文题记。此书为木斋先生捐赠之物。今人徐建委在《刘向〈说苑〉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认为北大残卷“实为云谦刻本，可能是初印本”。^①

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残本《说苑》，发现傅增湘所言“宋讳不避”的说法其实不确。该残本避“桓”字，“桓”字缺末笔。“桓”字缺笔是避北宋钦宗的名讳。

上海图书馆现藏有一部《说苑》残本，存十六至十九卷，半页11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有刻工。笔者专程去上海图书馆查看了此残本。此书曾为凌宴池夕薰楼收藏，书前有他写的序，云：

此南宋初年刻，为海内仅存之残本。明在晋府，清藏内阁。阁中人置诸怀袖携出者，索价太昂，久始得之。吴县曹元忠撰《笺经室遗集》卷十一跋宋槧残本《说苑》，即指此书。原《跋》考订精详，全文录后。

曹元忠跋语较长，兹摘录其中一段：

此红丝罗纹纸印本《说苑》，每半页11行，行20字。版心有洪茂、洪新、徐亮、许明等刻工姓名，亦有但作茂字、亮字者。卷中于“玄”“敬”“警”“殷”“微”“讓”“禳”“树”“桓”“完”“莞”等讳皆缺笔，于“慎”“敦”等讳皆不缺笔，当是南宋初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宋本《新序》，行款与此相同，刻工中有洪新姓名。李致忠先生定此书为南宋初年刻本^②。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黄丕烈“必是北宋以来旧本”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二，傅增湘“宋讳不避，疑为宋末元初覆刻之本”的说法是不确的。北大残本虽然不能断定为“北宋本”，但也应是两宋之间刻印的。第三，上海图书馆残本与北大残本当为同一时期不同刻版的本子，这两个残本《说苑》是现存最早的宋代刻本，其底本很可能是陆游跋本。

那么，北大本与黄丕烈所说的“校正说苑”本是什么关系呢？当是同一版本。何以为证呢？证据就是上海图书馆现藏元大德癸卯（1303）冬十月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

《校正刘向说苑》半页11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栏，有刻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著录此书。傅氏云：“此本字迹结体方整，而笔意圆浑，似元翻宋刻，俟再考之。”又云：“检取末册，有元人跋五行，录于左方，据此则元刊无疑矣。”今查《中华再造善本·校正刘向说苑》（全四册），其跋为：

宪使牧庵先生暇日出示刘向《说苑》，有益后学，俾綉之梓，以寿其传，诚盛事也。

大德癸卯冬十月朔，文学掾河南后学云谦敬书。

其实，此本不应是“元翻宋刻”，而是“元影宋刻”，其影刻所据底本即为北大本，也即为黄丕烈“校正说苑”本系统。

① 《文献》2008年第二期。

②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第32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

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看了宋刻残本《说苑》，比对后发现北大残本与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不仅行款完全相同，而且字迹也完全相同。然而，版本学家姚伯岳教授在认真比对后认为，二者虽然极为相似，但仍有差别，北大残本在前，云谦刻本在后。于是笔者再次进行了比对，发现字迹确有细微差别，姚伯岳教授所言极是。最后我的结论是：《校正刘向说苑》是影宋本。

再查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据“北宋本”手校之咸淳本《说苑》（中华再造善本），发现共有校语 102 处，校正内容分为三类：1. 校正咸淳本文字上的讹、衍、脱、倒；2. 指明北宋本章节提行处；3. 注明北宋本原有校语。令笔者惊讶的是，这 102 处校语所依据的内容，与元大德本《校正刘向说苑》完全吻合！另外，云谦在刻印《校正刘向说苑》时，对原书刻工的名字也予以保留，陈元、林庸等宋代刻工姓名赫然在册。这说明，黄丕烈所说的“北宋本”很可能就是北大残本。

为了使读者对元大德本产生的背景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下面对牧庵先生及其相关内容作一介绍。

首先从他的伯父姚枢说起。姚枢（1201—1278），由宋降元，遇赵复，始见程、朱之书，遂为理学信徒，成一代名儒。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赐姚枢金符，并让他做了燕京行台郎中。会蒙古族牙鲁瓦赤行台徇私舞弊，姚枢弃官“遂携家来辉（今河南辉县），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①姚枢在苏门山创建了太极书院，广收学子，多刻宋版，极尽儒学传播、教化之能事，推想《说苑》或在刻印之列。

牧庵是元代初期著名散文家姚燧的号。姚燧（1238—1313），字端甫，河南洛阳人。三岁而孤，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姚枢“携家来辉”时，姚燧只有四岁。姚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伯父的熏陶渐染，接触过大量的儒家著作，其中应有《说苑》。大德癸卯年间（1303）他出示给云谦的《说苑》，很可能是从其伯父姚枢手中继承下来的宋刻本。

云谦，生平不详，当是姚燧门生。他于元大德癸卯年间从恩师姚燧处见到了宋刻《说苑》。时年姚燧 66 岁，姚枢已经谢世 26 年，距曾巩整理《说苑》也已过去了 236 年。刻印《说苑》是姚燧继承伯父遗志、宏扬光大儒学之举，也是重现“北宋本系统”的善举，所以被云谦称为“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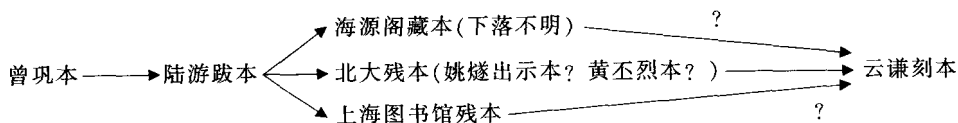
姚燧所示《说苑》的版式，云谦并无记载，但元大德本《校正刘向说苑》应当是直接反映姚燧藏书原貌的，即半页 11 行、行 20 字、白口、左右双栏、有刻工，与黄丕烈藏“校正说苑”本实为同一版本。

云谦所据底本书名为“说苑”，为什么他影刻的名为“校正刘向说苑”呢？黄丕烈校咸淳本时所据本的“校正说苑”四字告诉我们，很可能牧庵先生出示的本子原有“校正说苑”字样，而今存残本《说苑》也确有校语（《校正刘向说苑》全书共有校语 9 条，其中有“一本作……”之语）于是云谦借机将书名改成了“校正刘向说苑”，这也与元大德年间著名刻书家

^①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华书局 1985 年。

陈仁子所刻《说苑》(半页 10 行,行 17 字,黑口,左右双边)有了区别。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将所谓“北宋本系统”的发展脉络清理出来了:



从实际影响度上来说,似乎第二个系统(咸淳本)的宋本《说苑》要大于前者。因为咸淳本不仅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有明确记载,而且流传广,辗转于明、清多位著名藏书家之手。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咸淳本《说苑》,经过黄丕烈手校,上有黄丕烈和顾广圻的跋。但是,咸淳本比北大残本和上海图书馆残本晚 100 多年,而且北京、上海、台北三地所藏咸淳本皆非原貌,都经过明、清修补。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两个系统版式不同,其实是源与流的关系。笔者拿两个版本进行了比对,发现咸淳本在假借字、古今字、正俗字的使用上与北大残本无二。这就是说,所谓第二系统的咸淳本,是在第一系统的基础上再生出来的,而元大德本则是直接传承第一系统的版本,从亲缘关系上说,是嫡亲,因而也就显得格外珍贵。

故此,整理《说苑》一书,以云谦本为底本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多年来,云谦本“养在深闺人未识”,不仅卢文弨、朱骏声、孙诒让、刘文典等人在校对《说苑》时未曾提及^①,就是后来向宗鲁的《说苑校证》,赵善诒的《说苑疏证》,王锬、王天海的《说苑全译》,以及台湾学者左松超的《说苑集证》也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中华再造善本·校正刘向说苑》的印行,使此书得见天日,借用云谦的话说,就是“有益后学,俾綉之梓,以寿其传,诚盛事也”。

本《说苑译注》,以云谦本《校正刘向说苑》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据北宋本手校之咸淳本《说苑》为主校本。这两个版本都在 2008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珍贵古籍目录范围之内。同时,以明抄本(《四部丛刊》本)、《汉魏丛书》本、《摘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为参校本。另外,笔者也参照了在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说苑》中“反质”和“辨物”手抄残卷,力求使该书的译注工作较前人有新的进展。

四、《说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说篇》中最早评论该书。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批评该书“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到了北宋,曾巩开始对《说苑》进行整理。北宋末南宋初始有刻本。南宋时候,黄震、叶大庆开始研究《说苑》。《黄氏日钞》怀疑《说苑》为后人作伪。叶大庆在《考古质疑》中也指出了某些问题。到元代大德年间,出现了《校正刘向说苑》。明、清两代,《说苑》版本繁多,仅明刻本就有 34 种之多,并开始出现批校者。明代萧邑黄从诫著有《刘向说苑旁注评林》,对《说苑》进行了注释和评价。其注释有注音、释词、解句、解段和引注,颇为详备,比日本关嘉撰《刘向说苑纂注》至少早 110 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明代见冈堂《刘向说苑旁注评林》刻本,盖有“晚村之印”“吕氏家藏”朱印,说明此书曾为吕留良天盖楼所藏。此书罕见于清代藏书家,鲜有著录。此书最大的价值是,它体现了明代立《说苑》于学

^① 卢文弨《群书拾补》和朱骏声《说苑新序校评》所据元本为一坊本,非云谦本;笔者比对过,校语与云谦本明显不符。

官后作为“课本”的一种面貌。到清代,出现了一批研究《说苑》的学者,如黄丕烈、王念孙、孙诒让、卢文弨、俞樾、朱骏声等人。特别是卢文弨的《群书拾补·说苑》,用力最勤,成就最显,可谓第一部有分量的《说苑》校勘著作。以上为《说苑》研究的古代时期。

近代刘文典的《说苑斟补》是比较好的校本。该书以卢文弨校本为底本,兼采王念孙、孙诒让诸家之说,分条系于正文之下。又借助《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校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近人罗根泽写了《〈新序〉〈说苑〉〈列女传〉不始作于刘向考》一文,指出刘向是在《说苑杂事》基础上“得而校之”,非本人所撰^①。这算是《说苑》研究的近代时期。

到了现代,《说苑》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首先提到的当是向宗鲁的《说苑校证》。该书作于上世纪20年代,直到1987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用力深厚,多有创见,为国内学者《说苑》研究中最高成果。1930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发表,文中有关于《说苑》的研究成果。上世纪60年代,台大金嘉锡有《说苑补正》一书,对刘文典《说苑斟补》多有补正。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1979年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中《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此书首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说苑》的成书及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给后人以较多启发。1985年,赵善诒的《说苑疏证》出版,作者参照清陈士珂《韩诗外传疏证》《孔子家语疏证》的体例,以原文为纲,而以与诸书互见者备录于后,给读者阅读和研究带来很大方便。1993年,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了左松超的《说苑集证》。此书在前人基础上更加完善,考订详审,创见颇多,是《说苑》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徐复观之后,对《说苑》思想性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代表性成果是许素菲的《说苑探微》和谢明仁的《刘向〈说苑〉研究》。前者出版于1989年,后者出版于2000年。两书都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说苑》思想内容,后者还深入研究了《说苑》的成书、版本及文学价值,新见迭出。2005年出版的徐兴无的《刘向评传》是第一部刘向评传,书中第十一章专门研究了《列女传》《新序》和《说苑》。

这个时期的《说苑》译注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台湾学者卢元骏的《说苑今注今译》初版于1977年,后又经过再版和修订。此书首开《说苑》译注先河,注释和译文难免有可商榷之处。1992年,王镆、王天海的《说苑全译》出版,这是大陆第一个完整译本。1994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钱宗武的《白话说苑》。1996年台北三民书局同时出版了左松超和罗少卿同书名的《新译说苑读本》。从质量上看,左书胜于罗书。这个时期的选译本有1986年范能船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说苑选》,1990年巴蜀书社出版的曹亦冰选注的《说苑新序选译》,1991年马达、顾易生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序说苑选译》,1993年华晓林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写给皇帝看的书——〈说苑〉》。这些选译本在《说苑》普及工作上功不可没。

最后说一下日本研究《说苑》的情况。据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记载,早在唐代,日本就有关于《说苑》的记录。今藏于日本的《说苑》版本有明楚府刊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刊本、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何良俊刊本和明刊《汉魏丛书》本。1793年,日本学者

^① 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其实,罗氏所持观点并不新鲜,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中早就指出:“如《老》《庄》《管》《商》《韩》,皆自成一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书之一变也”。

关嘉撰《刘向说苑纂注》，是日人较早的《说苑》研究著作。1798年日人桃源藏撰有《刘向说苑考》。另外，还有饭仓照平的《说苑解说》。

总起来看，《说苑》虽不像四书五经那样学者如林，成果众多，也不像老、庄、荀、墨那样备受重视，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还是得到了学者的充分肯定。今天，《说苑》研究呈现出颇为可喜的局面。本《说苑译注》的出版，算是作者再添青枝绿叶，以期去衬托那红硕的花朵。

五、关于本书编写体例的说明

一、本书为《说苑》普及读物，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简评四部分。佚文不收录。重在注释和翻译，兼顾简评。

二、本书以上海图书馆藏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校正刘向说苑》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据北宋本手校咸淳本《说苑》为主校本，兼顾众本。

三、注释和校勘合为一体。注释力求准确、详细。校勘中对通假字、古今字、正俗字等尽量保持原貌，不宜保持原貌的则标注为异体字；须加说明的，简要注出。章节划分原则上遵照原书，个别地方有调整，简要注明。

四、“简评”或评价，或说明，或考释，灵活掌握。有的章节没有必要简评，则付阙如。

五、每卷前有“题解”，总体解说本卷内容，可视为导读，对初读本书的读者有所帮助。

六、译文力求直译，个别不便直译的采用意译。译文力求准确、流畅，便于初学者阅读。

七、注释、翻译、校勘中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尽量注明。没有注明的，是考虑到行文简便，绝无掠美之想。

八、注音以《汉语大词典》为准。

目 录

前 言	1
卷一 君道	1
卷二 臣术	39
卷三 建本	63
卷四 立节	86
卷五 贵德	105
卷六 复恩	130
卷七 政理	158
卷八 尊贤	190
卷九 正谏	224
卷十 敬慎	252
卷十一 善说	279
卷十二 奉使	307
卷十三 权谋	328
卷十四 至公	361
卷十五 指武	381
卷十六 谈丛 ^①	402
卷十七 杂言	429
卷十八 辨物	463
卷十九 修文	495
卷二十 反质	534
附录一 说苑叙录	刘 向 557
附录二 说苑序	曾 巩 558
附录三 参考文献	559
后 记	562

① 云谦刻本“目录”中作“丛谈”，正文中作“谈丛”。本书统一作“谈丛”。